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 70 年： 经验、反思及展望

周士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外交政策研究所, 上海 200233)

摘要: 中越于 1950 年 1 月 28 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标志着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真正开始。70 年来,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既经历过敌对和挫折、冷漠与警惕, 也呈现出缓和与改善、睦邻和友好, 当前进入了密切沟通合作的新时代。从历史上看,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互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战略经验, 例如, 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不盲目追随或模仿其他国家; 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也坚决不让其他国家干涉本国内政; 在促进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增进地区和平与繁荣; 尽量避免域外因素无谓干扰, 协商一致自主解决相互间的问题。同时, 双方也汲取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挫折和教训, 如双方都要认识到自己和其他国家实力和能力的限度, 尽量采取避免伤害对方的行为, 不要对其他国家期待太高, 也不要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 不能现实主义地考虑地区热点难点问题, 更不能陷入安全困境而无法自拔, 而是要建设性找到符合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案, 以合作促进可持续安全和繁荣。展望未来,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要站高位, 塑造命运共同体理念; 望长远, 巩固和增进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 稳住心, 维持地区合作机制稳健运行; 亮实处, 让双方合作项目工程成为增强相互认同的粘合剂, 让地区各国和各国人民体验到平等互惠、合作共赢产生的获得感。

关键词: 东盟; 周边外交; 命运共同体; 战略伙伴关系;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20)01-0002-12

DOI:10.14073/j.cnki.nywtj.2020.01.001

追根溯源, 东南亚是一个地理概念, 更是一个政治概念, 产生于冷战初期最为激烈的美苏争霸之时。然而, 几十年来, 随着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演进, 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地区一体化的发展, 东南亚的地理特征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而其政治属性与其经济和社会文化属性一起成为地区环境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特别是与中国接壤的东南亚国家, 不仅与中国存在更长久、更密集的接触史, 而且形成了相互间复杂而纠结的恩怨情仇。历史上的郑和下南洋、周达观出使真腊^①等体现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互动关系以及对这些国家的认知, 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为人津津乐道的轶事, 不仅增添了地区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也为当前各国相互处理双多边关系时

收稿日期: 2020-02-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南亚安全格局对我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影响研究”(16ZDA091)

作者简介: 周士新, 男, 安徽霍邱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法学博士。

^① 参见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年。

提供了参考借鉴,推动或阻碍着地区国家间多双边合作。近代以来,中国与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遭到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殖民或半殖民国家,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各种形式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政权,进入国家建设的新时期。然而,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的斗争也波及到中国 and 东南亚国家,导致地区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多样性和地区形势的不稳定性。正是如此,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越南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1月28日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4月13日和6月8日,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也与中国正式建交,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至今已经有70年历史。

70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不断发展演进,成为中国推进和发展周边和地区外交的重要表现,东南亚也逐渐成为中国周边最具活力的次地区。从发展过程上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大致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50年代,在坚持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旗帜下,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60年代,随着中国与美苏关系都比较紧张,与绝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也陷入低谷,甚至出现破裂的现象。在70-8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转圜和转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转好,并与大多数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冷战结束后,中国很快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加入到东盟倡议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并始终发挥着建设性的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亚金融危机进一步推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并在21世纪初随着中国提出与东盟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加速了相互间的一体化进程。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迈入新时代,因此,总结过去70年来的双方关系,对理解未来相当长时期的发展方向,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考量因素,以及地区国家共同的利益与关切契合点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经验

从地理上看,当前的东南亚地区至少有11个国家,有的具有悠久的大一统历史,而有的则是近现代以来逐渐形成并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即使从目前情况来看,最晚获得独立的东帝汶尚未加入到该地区其他10个国家组成的东盟。另外,东盟只有5个创始成员国,加上文莱,统称为东盟老成员国,而其他4个中南半岛国家,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则被称为东盟新成员国。东盟10个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等也存在较大差异,内外政策也具有一致性和矛盾性,相互间的双边关系并不都总是比其与有些非东盟国家^①的关系更为紧密和融洽。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并不完全一样,很难使用某个统一的模式来进行阐述和分析,更不能以某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然而,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经过了70年的外交互动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值得各方都应比较赞同的经验,成为当前和未来应继续共同遵循的圭臬。

首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和政治历史文化,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追随或模仿其他国家。除了泰国,东南亚国家在近现代都曾被西方列强殖民过,有些甚至不止被一个西方列强先后殖民过。例如,菲律宾先后成为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地,二战时期一度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来再次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直到1946年7月4日,美国才同意菲律宾独立,并在1951年与菲律宾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至今对菲律宾仍具有较大的影响。新加坡曾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期间一度被日本占领,后来英国恢复了殖民统治,1959年实现自治,1964年9月与马来亚、沙巴、沙捞越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但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处于东南亚最边缘的东帝汶历史上长期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5年得到葡萄牙政府的授权

^① 为行文方便,如果不需要包括东帝汶,本文会使用东盟国家代替东南亚国家。——笔者注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实行民族自决,但在当年却沦为印度尼西亚的第27个省,直到2002年5月20日才在联合国的介入下正式成立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另外,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是法属印支联邦的一部分,但越南和老挝经过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柬埔寨却因为国内冲突引发联合国介入,最终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而3国在体制机制上仍具有较强的相似性,相互间的各领域、各层级联系依然非常密切。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相似,中国在经历过长期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斗争和国内解放战争后,也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尽管中国与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40-50年代就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但发展道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对外政策上既存在一致性,但也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在冷战时期的一段时间内,出于维护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考虑,中国曾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具有一定的联系,引起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紧张,甚至和印度尼西亚外交关系的中断。然而,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逐渐改变了这一政策,为建立、改善和恢复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从当前中国来看,东南亚国家似乎是一个整体,然而,冷战时期的东南亚国家却处于相当分裂的状态,东盟的建立也没有将这些国家凝聚在一起。冷战结束后,随着东盟逐步扩员,内部凝聚力一度不仅没有增强反而有所减弱,使之成为东盟内部始终强调推进的主题。东盟即使在宣布建成共同体后仍没有放弃这一政策理念。东盟强调维持多样性的统一,是因为其难以改变大一统下的多样性。^[1]成员国之间相互间在尊重其他国家自我选择的前提下,保持着最低程度的合作态势,追求着最高程度的合作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甚至超过了它们大多数之间的外交关系。

其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坚持现代主权国家理念,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也坚决不让其他国家干涉本国内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自决理念成为全世界广大殖民地国家的强烈诉求,并为之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取得了成功或部分成功。一些前殖民地国家依然是所谓的英联邦、法语国家组织、葡语国家共同体的成员,显示出相互间历史纽带所产生的现实效果。由于中国和绝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都是后发国家,政治经济上长期受制于西方垄断的世界体系,脆弱性所产生的敏感性相当强烈。然而,中国和东南亚前殖民国家一样,虽然依然残留着一定程度的后殖民思维或行为,但都已经成为了完全的独立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具有完全的自主权。也正是如此,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高度重视内政与外交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国际形势可能对国家内部事务的影响。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坚持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其他国家干涉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国和东南亚的缅甸及印度尼西亚都倡导和高度重视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潘查希拉”等,成为地区国家指导相互间关系的重要理念和指导原则。无论是东盟在1976年2月24日通过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还是后来的《东盟宪章》都将之作为自己的核心内容。中国与东盟国家在2002年11月4日通过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作为共同的指导准则,特别是中国在2003年10月8日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体现出双方在处理相互间关系上的高度一致性。

虽然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的考虑,东盟认可了所谓“保护责任”的正当性,^[2]并为此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努力,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依然最大程度地保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这从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的建立就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一般来说,人权问题是个非常泛化的概念,往往会超越主权国家边界,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发生在某个主权国家内部的,因此人权问题经常会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然而,东盟成立的人权委员会却是政府间性质的,即成员国内部的人权问题是其内部事务,通过与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具有较多业务联系的本国人权委员会采取措施进行管理,东盟或其他东盟成员国并没有权利进行干涉。因此,即使缅甸出现了因若开邦危机而引发难民问题,甚至导致缅甸和孟加拉国之间的矛盾,但东盟仅在内部讨论中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寻求通过能力建设等帮助缅甸缓解和解决棘手问题。^[3]当然,这并不能完全杜绝部分东盟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

在东盟框架之外评论缅甸难民问题,并向缅甸政府施压。东盟国家认识到,单纯的政治外交施压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恶化相互间的关系,影响东盟的团结和凝聚力。当初缅甸军政府曾多次威胁要退出东盟,在泰国等推出“建设性接触”后,与东盟的关系才有所好转,^[4]开启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再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互动中增强共同身份认同,并在促进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密切相互间的关系,增进地区和平与繁荣。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是从冷战结束后才真正开始的,从最初建立自贸区构想,到2015年12月底宣布建成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支柱的共同体,到目前依然在继续塑造“一个愿景、一个身份、一个共同体”的进程;从最初东盟内部各职能部门会议和领导人会议,到目前东盟+1、东盟+3、东盟+6和东盟+8等各种综合性、多领域、多层级合作机制。无论是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还是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都促进了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多边机制成为讨论国际和地区热点和难点问题的重要平台。无论是东盟自贸区、东盟+1自贸区还是已经完成谈判进程,开始进入签署程序的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5]都在增强越来越广范围的地区一体化程度。此外,除了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之外的东盟成员国都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对维持亚太经合组织的组织结构 and 运作模式具有较大影响。东盟+3(中日韩)金融合作促生的清迈倡议和清迈倡议多边化对维持地区金融秩序稳定和金融新秩序建构具有重要保障作用。^[6]此外,东南亚国家之间及其与域外国家之间的互动还越来越多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对促进与中国在内的地区身份认同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与此同时,地区一体化的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效应^[7]也推动了东亚、甚至亚太成为世界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东盟在捍卫自己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具有中心地位的同时,^[8]也在加紧协调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认可和支持其提出的更多包容性议题,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增强更强大动力。

最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尽量避免、排除甚至排斥域外因素干扰,坚持通过小多边或双边方式处理和解决相互间的问题。东南亚国家主要是中小国家,绝大多数军事安全实力并不强,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综合实力相当弱,因此在参与管理国际和地区事务的过程中往往会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为域外国家发挥影响作用提供了各种机会,往往产生有悖于这些国家的意图和利益的结果。因此,东南亚国家坚决反对外部力量干涉自己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各种事务,不愿屈从其他国家的意志,更不愿意被认为是牺牲了本国利益,导致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合法性降低或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问题的直接当事方组成的双边、小多边方式^[9]、诉诸第三方国际机构和邀请他国建设性干预处理或解决地区棘手问题,往往会成为最为常见的方式。以领土主权和海域管辖权划界为例,东盟绝大多数国家之间都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其中很多都是通过长期的双边外交谈判方式解决的,还有很大部分仍在以这种方式处理之中,在最终解决方案达成之前处于相对搁置的状态。当然,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10]及新加坡^[11]在双方都同意的前提下,诉诸国际法院解决了相互间的岛屿划分和海域划界的问题。泰国和柬埔寨在因边境划界纠纷而产生冲突后,拒绝了东盟和联合国的调停,但在柬埔寨请求国际法院重申1962年裁决结果^[12]后放弃了继续纠缠,维持了两国关系的稳定运行。当然,最为典型的还是部分东盟国家之间及其和中国之间在南海地区的争端。尽管只有中越之间通过双边外交谈判方式解决了北部湾内的划界问题,中菲之间也开启了双边谈判进程,但其他解决方式仍没有启动,或没有得到有效启动。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继续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的进程,在没有域外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已经取得了明显进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70年的外交互动进程,反映出双方都希望在维持底线思维的基础上,促进最高程度的双多边合作。也正是如此,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外交理念上存在着较多的一致性,推动着双方关系从相互漠视敌对、有限有效互动、建立信心和信任,到促进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建设。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奠定了加强合作的信任基础,而双方在许多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相互协商协调,也增强了地区一体化演进动力。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3]充分体现了这种合作关系的合理性。当然,无论是东盟国家强调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基础的“东盟方式”还是中国高度重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主张以协商一致原则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基本准则。从一定程度上看,中国与东盟从对话伙伴到全面伙伴,从1997年12月16日开始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到2003年10月8日开始的“致力于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身份建构也充分反映了这一进程,成为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甚至东盟与其他大国发展关系的典范及重要参考。

二、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反思

然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毕竟不是同一等量级的邻国,而且邻国之间也并不总是会和睦相处的,双方之间的互动可以增进对对方的外交行为模式和理念的了解和理解,但却不一定会让一方自觉接受对方的外交政策实践及其产生的结果。正如不同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的不同核心范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性和矛盾性一样,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既存在着相当强的动力,但也具有相当高的限度,推进也制约着国家间关系的程度。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历史上也并不总是和平友好的,冲突甚至战争也存在过,邻国间的传统安全困境意识^[14]至今依然困扰着东南亚国家对外的外交政策,成为双方在处理双边甚至多边问题时经常考虑的因素。也正是如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过去70年外交互动中的有些政策教训非常值得双方深入反思,从而为进一步发展更稳健关系必提供借鉴。

首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要认识到自己实力和能力的限度,避免采取过度刺激对方的行为,更不要做出自己无法兑现的承诺,以防让自己陷入困境之中。作为一个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大国,中国的实力、能力和影响力依然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抱负往往也应与此保持一致,不能以居高临下的霸权心态看待东南亚国家,更不能对其诉诸强权政治,迫使其遵从中国的战略意志。从历史上看,尽管中国并没有建立地区霸权的野心,但在支持部分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与部分国家还存在华人国籍问题,让这些国家对中国产生强烈的戒备和猜忌心理,不愿意甚至不敢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外交关系,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因此疏远甚至恶化了。与此同时,中国的支持政策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反而耗费了大量的战略资源,恶化了周边战略环境,影响了国家建设的进程和质量,最终不得不改变直至放弃这种超出自身实力,且易造成双输局面的战略行为。从东盟的角度来说,虽然始终强调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的中心地位,包括中国在内的对话伙伴也高度认可并支持这一点,但东盟并不能迫使其成员国甚至对话伙伴接受可能损害其国家利益的过分要求。东盟不会试图奢求自行其是,^[15]更不会建立一种能超越其成员国或对话伙伴国家主权的集体霸权。一旦东盟国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陷入分歧,甚至因分歧而导致冲突,就有可能导致东盟分崩离析,反而会削弱东盟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东盟可以利用的战略资源并不充分,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不得不秉持中立政策,避免因不能落实某些集体性决策而陷入困境。^[16]例如,东盟在没有与中国磋商的情况下,在2012年7月单方面通过了《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六项原则》,^[17]不仅没能将其纳入到有中国参加的地区多边会议最终政策文件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与中国发展更紧密合作关系的环境。

其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要认识到对方实力和能力的限度,避免对其他方存在过高期待,提出一些对方无法兑现的要求,以防引起对方的不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与东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确实能为自己提供总体有利的战略环境,甚至为经济持续性高速发展提供许多机会,与东盟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密切协作作为自己进一步改革开放提供重要动力和机遇,也奠定了信心基础。然而,东盟

毕竟是中小国家的集合体,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在政治安全方面对中国依然存在着天然的畏惧感,难以甚至不愿在许多地区事务上追随或支持中国,在很多时候还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来牵制中国,避免因为和中国在力量上过于悬殊导致不得不依附于中国,丧失自己既有的对冲、合作或搭便车等战略自主选择权,^[18]甚至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中国需要给予东盟及其成员国一定的舒适度,让其在与中国进行互利共赢的互动过程中加强政策协调,在促进地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也增进双方的战略协同度。对东盟来说,中国确实是个大国,对地区和平与繁荣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也必须肩负起一定程度的责任。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中国在冷战期间放弃继续向东南亚共产党提供支持,基本上解决了华人国籍问题,^[19]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和其他途径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还是在南海问题上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部分东盟国家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承诺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抑或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积极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都让东盟及其成员国感受到了中国切实在贯彻实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然而,东盟也要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涉及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上有自己的原则立场,要尽量避免提出中国难以甚至无法接受的政策主张或要求。中国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核心问题上的政策底线并不比东盟成员国高多少,东盟国家在寻求与中国相互平等和尊重的过程中,也需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理解中国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或做出妥协。

再次,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不能仅从自身角度来思考相互关系和地区热点难点问题,而是要坚持以更积极的建设性态度处理和管理相关问题,避免被这些问题所绑架,影响地区和平与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始终保持在较高稳定运行状态,主要得益于双方都能够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思考相互间的问题,而不是纠结于一些可能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局部或个别问题上。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当前面临的巨大压力还是来自于中美战略博弈所产生的地区影响,导致他们可能面临着在两者之间必须选边站队的问题。^[20]中国和美国都对东南亚国家提供了重要市场和投资援助等,似乎都在加紧拉拢这些国家向自己靠拢,只是美国通过提出所谓的“印太战略”“蓝点网络”计划等,还试图强制东南亚国家在许多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切割,或向中国施加压力,而中国也加大了抵制美国战略强制和经济胁迫的政策,消解美国原本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优势。中美战略博弈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双方的贸易摩擦。尽管双方已经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前期贸易冲突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在国际和地区生产、销售和消费等价值链上得到了较充分体现,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造成持久影响。

南海问题是东盟国家政界、学术界和舆论界经常提及的地区热点问题,但只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局部问题,不应成为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重要因素,更不能成为东盟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的理由。部分东盟国家之间在南海地区也存在着岛屿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争端,与绝大多数东盟国家之间在其他海洋区域的同样问题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从历史上看,东盟国家之间往往首先是以双边谈判方式处理此类问题的,只有上文中提到的个别案例被提交到国际法院进行裁决。迄今为止,东盟国家并没有诉诸《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四章成立高级委员会处理此类问题,也没有将此类问题列为东盟必须优先解决的议题,而是采取不干涉的方式,让相关东盟成员国自行处理,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维持东盟的团结和凝聚力。^[21]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就不属于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南海问题更不应成为东盟必须讨论的议题,而是应遵循“双轨思路”和协商一致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主权问题,通过友好协商促进南海安全与稳定。中国和东盟及其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合作议题,南海问题只是其中存在一定负面效应的议题之一。随着“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结束及落实,加上中国与东盟一体化建设进程取得更多成效,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不仅会有所降级,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进行更密切合作的新增长点。

最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不要陷入安全困境的陷阱中而无法自拔,而是要寻求以合作促共同安

全,以进步促共同发展,在合作中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相互间的问题。比较而言,绝大多数东盟国家要比中国的冷战思维更强一些。主要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担心与中国的过度合作会让自己在大国博弈中丧失自主权和独立性,成为必须屈从中国意志的附庸国,并可能导致国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一些东南亚国家政治和社会精英的这种意识在西方舆论影响下,特别是他们当中的部分人士长期在西方战略思想的熏陶下,正在让其国家的政治文化发生变化,逐渐习惯于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逻辑为基础,简单化地处理一些原本相当复杂而棘手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东南亚国家在维持与中国保持战略平等的过程中,是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大国博弈,更是以安全困境意识为出发点实行其所谓的大国平衡战略的。也正是如此,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例如,中国和菲律宾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具有战略性,中国和新加坡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同样不具有战略性,而和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没有强调双方的合作倾向,和最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越南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不能阻止双方在南海问题、大湄公河次地区合作、经贸平衡及其他一些地区问题上存在政策分歧,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为双方需要继续努力克服的重要方面。

三、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前景

经过 70 年的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达到当前的程度,真可谓来之不易。虽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是近邻甚至紧邻关系,但双方在冷战期间还是存在着许多隔阂和猜忌,至今仍难以彻底消除,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潜在甚至显在因素。然而,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实行睦邻友好政策,快速改善并提升了与东盟地区的关系,并在近年来呈现出赶超美国和日本的态度,成为东南亚国家最重要的对话伙伴之一。当然,中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明确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第一个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第一个公开表示愿同东盟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第一个同东盟启动自贸区谈判进程,^[22]在实践中不仅在补齐与其他国家和东盟在政治安全方面的短板,而且在进一步发挥和增强在经济领域的优势,更在增进与东盟的社会文化认同感,成为一个有责任和担当,够资格的东盟对话伙伴。中国提出的一些推进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新项目,也正在为促进地区形势朝着有利于双方共同利益的方向持续稳健与和平地演进奠定更扎实基础。也正是如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还需要立足现在,展望未来,为双方建立更高层次的合作提供政策支撑。

首先,要站高位:巩固和夯实睦邻友好的战略理念,建设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2013 年 10 月 3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不仅宣布要与东盟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且提出推动建立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3]2015 年 11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努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24]然而,东南亚国家更加关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中国在共同促进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政策协调,吸引中国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提升双方的贸易关系,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劲动力,^[25]但对中国提出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却相对冷淡。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东南亚国家并不完全清楚中国倡议的实质内涵,感到在实践中不如“一带一路”倡议更具操作性。还有些东南亚国家认为支持中国的倡议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在中美战略博弈中选边站队,反而会让自己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上。当然,几乎所有东盟国家都认为,2015 年底建成的东盟共同体建设在内容上并不完整,在质量上并不完美,距离欧盟型的地区共同体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担心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最终也会流于形式,因此对中国的提议缺乏兴趣,也缺乏信心。

然而,随着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增强了相互信任,特别是落实中国-

东盟自贸区及其升级版,“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发展规划战略对接取得成效,推进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26]开展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和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27]等方面的协调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部分东盟国家开始逐渐认可并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设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7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Boungnang Vorachith)一致同意不断丰富和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老高度互信、互助、互惠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牢不可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8]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本扬总书记、国家主席同意以签署《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9]为契机,为中老关系长远发展提供重要指引,共同打造新时代中老关系。^[30]2019年4月28日,李克强总理和洪森首相签署了《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不断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价值和丰富内涵,推动双边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31]2020年1月18日,中缅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建交70周年为契机,弘扬中缅传统“胞波”情谊,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新时代。^[32]可以想见,随着更多东盟国家认识到与中国建设命运共同体的互惠互利性和增进融合性,中国-东盟共同体建设将成为双方关系在新时代的新现实。

其次,要望远:巩固和增进战略伙伴关系,共同维护和保障地区和平与繁荣。自200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有效落实了多项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行动计划,对稳定和促进双方关系提供了重要动力。自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成员国发展规划对接取得了巨大成就,2018年11月14日,第21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通过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为双方共同建设开放包容、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作出贡献。^[33]2019年11月3日,第22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超越了以往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在双边层面上的战略对接,上升到双方在地区层面上开展更具机制性的密切合作。中国和东盟之间的合作已经不能仅局限于短期合作,而是要更具前瞻性,从而为双方在分阶段逐步推进合作议程时更符合双方的战略预期。当然,从东盟的角度来看,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对话伙伴加强合作不仅要保持适度性,而且还要维持平衡性,在当前与美国贸易关系处于困难的关键时期,中国是其必须高度重视的不可或缺的选择对象。同时,东盟国家也认识到,从未来相当长的时段来看,维持和加强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有助于东盟及其成员国保持稳定快速增长,至少有利而不是有损于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特别是东盟国家的根本切身利益。

再次,要稳住心:保持地区双多边合作机制的稳健运行,避免大局失控的风险。鉴于东盟大多数成员国政治安全实力并不强劲有力,经济增长基础并不沉稳雄厚,东盟一体化进程遵循着循序渐进的方式稳步向前发展。东盟的绝大多数决议都建立在成员国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也让以合作为主要导向的东盟一体化进程进展缓慢。这也意味着,一方面,东盟几乎所有议题都是合作而非冲突型的,是正和性互动而非零和性游戏,不会对任何一个东盟成员国的利益构成实际伤害;另一方面,如果某个东盟成员国不满意东盟其他成员国的某个提议,或担心该提议会损害其利益,可以拒绝表态支持该决议,让该决议处于暂停状态中,待各方再次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才进入落实程序。此外,即使某个东盟国家没有能切实落实已经通过的政策声明,也不会受到惩罚。没有得到充分授权的东盟没有实力也没有能力强制其成员国兑现已经作出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东盟的许多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或完全落实,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东盟制度建设的质量和地区一体化的进度。也正是如此,东盟稳健而缓慢地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成为其发展的最明显特征。这既是其成员国采取相当慎重政策措施的结果,也是部分成员国及部分对话伙伴感到不满意的重要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提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东盟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对接,也是想通过采取更积极政策,推动东盟及其成员国自愿在加强地区互联互通建设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促进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过程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开始与东盟国家磋商“南海行为准则”,并在 2002 年达成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此后,中国和东盟国家先后成立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高官会和联合工作组会议机制,对维持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和维护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地区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2013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六次高官会和第九次联合工作组会议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举行,正式启动了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进程。^[34]2016 年 9 月 7 日,第十九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对增进互信和信心、降低海上风险,相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南海争议,不让有关分歧影响东盟与中国关系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35]截至目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已经完成了一读,正在进行二读的关键阶段,预计到 2021 年结束。可以想见,随着“南海行为准则”进入落实阶段,中国和东盟及其成员国关系将进入更稳健时期,一些域外国家对南海问题的影响会进一步减弱,南海地区局势的稳定也会为相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主权和海洋管辖权争端提供更为有利的战略环境。

最后,要亮实处:有效落实互利共赢的项目工程,创新增强相互认同的粘合剂。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老挝的“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泰国的“现代化 4.0”战略、“东部经济走廊”(EEC)及国家发展战略规划(2019-2038),缅甸的经济特区发展计划,越南的“两廊一圈”战略,柬埔寨“四角战略”,马来西亚的“国家发展计划”,菲律宾的“大建特建”计划,新加坡的“未来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文莱的“2035 宏愿”等进行了有效对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表现为建设经济走廊、经济特区、经济合作区、工业园区、两国双园等多类合作方式。代表性项目更是多种多样,如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印度尼西亚的雅万高铁、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线、菲律宾南北铁路的南线项目等,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缅甸仰光新城、文莱摩拉港、马来西亚巴生港等港口建设等,此外还有更多的知名度不太高和规模较小的合作项目。目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几乎在各领域都建立了功能性的伙伴关系,并逐渐在许多具体项目上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如第二十二届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议领导人声明》,^[36]推动双方在政策研究、标准制定、技术创新、市场共享、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合作,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为东盟智慧城市网络打造合作平台。^[37]此外,中国更积极与东南亚国家开展社会文化交流,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宗教外交、科技外交、媒体外交等已经成为增进相互间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例如,第二十二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了《深化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的联合声明》,^[38]还将与东盟共同制定《中国-东盟视听传播合作五年行动计划》,为双方媒体合作规划方向和路径,让世代友好薪火相传^[39]提供良好舆论氛围。

结语

虽然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正式外交关系只有 70 年,但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却更为长久,而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互动更可谓历史悠久,这些都在为双方总结过去经验与教训,塑造未来更适合双方关系的共同体路径提供前车之鉴和正确路径。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坚持以一个东盟国家的行为模式与东盟及其成员国打交道,目前已经将“东盟方式”的理念和规范融入到塑造和建设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则和准则之中。也正是如此,中国始终能够照顾到东盟及其成员国的敏感性和舒适度,努力寻求双方最大程度的战略契合点,推进而不是引领双边关系和地区多边合作进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另外,东盟在 2019 年推出自己的“印太愿景”,但最终能否有效落实并取得预期成果,不仅取决于东盟成员国的共同努力,更取决于其对话伙伴,特别是中国的态度和行

动。^[40]中国近年来确实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无论是命运共同体还是“一带一路”倡议都不仅没有伤害性,而且具有极强的互惠性质,能够对促进东盟的可持续及包容性增长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东盟及其成员国提升共同体建设质量奠定基础,增强东盟国家维护其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中的中心地位的能力和信心,认识到中国是其在越来越不确定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中更适合开展合作的确定对象。中国对东盟及其成员国提供的战略确定性虽然不能彻底消除其长期以来积淀下来,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对周边强大邻国的恐惧和猜疑,但至少让它们认识到,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理念和政策举措是可以预期的,也是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会坚持底线战略思维,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受损害,但也会以更具潜力的美好愿景为导向,稳步推进双方合作关系朝着更有利于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共同目标迈进,将双方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真正践行到实处,让地区国家和人民都能够体验到真实的获得感、幸福感。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如有偏颇或谬误,概由笔者负责。)

注释:

- [1] Eng Hoo Lee, “Unity in Diversity Building an ASEAN Identity”, in Ha Chae Kyoung, *The Future of ASEAN-Korea Partnership*, Vol. 3, ASEAN-Korea Centre, ASEAN University Network & Korea Herald, 2018, pp. 81-98.
- [2] Surin Pitsuwan, Hung Nguyen Duy, Makarim Wibisono, Marina Mahathir, and Alberto Romulo, *Mainstream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Southeast Asia: Pathway towards a Caring ASEAN Community*, Report to High-Level Advisory Panel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 Southeast Asia, Presented at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September 9, 2014, https://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documents/responsibility-to-protect/HLAP%20Report_FINAL.pdf.
- [3] Chheun Sokla, “ASEAN’s Preventive Diplomacy What Roles for ASEA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Rakhine State Issues”, *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9, No. 2 (2019), p. 452.
- [4] Leszek Buszynski, “Thailand and Myanmar: The Perils of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1, No. 2 (1998), pp. 290-305; Logan Masilamani and Jimmy Peterson, “The ‘ASEAN Way’: The Structural Underpinnings of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ctober 15, 2014, <https://www.foreignpolicyjour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4/10/141015-Masilamani-Peterson-ASEAN.pdf>; 范宏伟《东盟对缅甸“建设性接触”政策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2期,第30-39页。
- [5] ASEAN,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o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November 4, 2019, Bangkok, Thailand, <https://asean.org/storage/2019/11/FINAL-RCEP-Joint-Leaders-Statement-for-3rd-RCEP-Summit.pdf>.
- [6] Kaewkamol Pitakdumrongkit, “The Politics of East Asian Financial Agreement: The Case of the CMIM”, in Tomoo Kikuchi, Masaya Sakuragawa, *Financi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RSIS Monograph, No. 35, March 2019, pp. 65-71,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9/04/MN35_190409_Financial-Cooperation-in-East-Asia.pdf.
- [7] 房乐宪《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功能主义》,《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10期,第34-38页。
- [8] Mely Caballero-Anthony, “Understanding ASEAN’s Centrality Bases and Prospects in an Evolving Regional Architectur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7, No. 4 (2014), p. 563.
- [9] Chheang Vannarith, “Multilateralism in Southeast Asi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VI Perspective*, No. 4 (2019).
- [10] *Case Concerning 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December 17, 2002,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02/7714.pdf>.
- [11] 《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归属案》,见《国际法院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2008-2012年)》,联合国·纽约2014年,第1-8页 http://legal.un.org/ICJsummaries/documents/chinese/st_leg_serf1_add5_c.pdf.
- [12] 《关于要求解释柏威夏寺案(柬埔寨诉泰国)中1962年6月15日判决的申请(柬埔寨诉泰国)》,见《国际法院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摘要》2013年11月11日的判决 http://legal.un.org/ICJsummaries/documents/chinese/203_c.pdf.
- [13] 佳欣《商务部:东盟已成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新华网,2019年7月31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7/31/c_1124821163.htm.

- [14] Deniz Kocak, "Insurgencies, Border Clashes, and Security Dilemma – Unresolved Problems for ASEAN", *CEJISS*, Vol. 7, No. 1 (2013), pp. 1-17.
- [15] Donald K. Emmerson, "ASEAN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s It Time to Try Horsing the Cow", *TRANS: Trans Regional and National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 Vol. 5, No. 1 (2017), p. 20.
- [16] Simon Tay, "ASEAN Centrality and Collective Leadership: New Dynamics and Responses", in Simon Tay, Shiro Armstrong, Peter Drysdale, and Ponciano Intal Jr., *Collective Leadership, ASEAN Central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ASEAN Institutional Ecosystem*,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2019, pp. 90-101.
- [17] ASEAN, *ASEAN's Six-Point Principl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Phnom Penh, Cambodia, July 20, 2012, <https://www.asean.org/storage/images/AFMs%20Statement%20on%206%20Principles%20on%20SCS.pdf>.
- [18] Kei Koga, "ASEAN's Evolving Institutional Strategy Managing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1, No. 1 (2018), p. 78.
- [19]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新加坡联合早报出版社,2000年,第669-670页。
- [20] Yang Razali Kassim, "US-China Conflict Will ASEAN Centrality Be Derailed", *RSIS Commentary*, No. 109 (May 31, 2019).
- [21] Alfred Gerstl,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 Shift to a more Proactive Role in ASEAN's Discourse and Policies since 2012?" in Alfred Gerstl and MáriaStrašková, *Unresolved Border, Land and Maritime Disputes in Southeast Asia Bi- and Multilateral Conflict Resolution Approaches and ASEAN's Centrality*, Leiden: Brill, Studies on East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4, 2016, p. 196.
- [22] 《李克强在第19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6年9月8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6-09/08/content_5106318.htm。
- [23]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国政府网,2013年10月3日 http://www.gov.cn/ldhd/2013-10/03/content_2500118.htm。
- [24] 习近平《深化合作伙伴关系 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新华网,2015年11月7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07/c_1117071978.htm。
- [25] Huong Le Thu, "China's dual strategy of coercion and inducement towards ASEA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2, No. 1 (2019), p. 13.
- [26] Heng Wang, "Building Towards the RCEP? Reflections on the ASEAN-China FTA", *UNSWLRS*, No. 74 (2018), <http://www7.austlii.edu.au/cgi-bin/viewdoc/au/journals/UNSWLRS/2018/74.pdf>.
- [27] *Statement of the Special ASEAN-China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on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Vientian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February 20, 2020, <https://asean.org/storage/2020/02/ASEAN-China-SFMM-Statement-on-COVID-19-20-Feb-2020-Final.pdf>.
- [28] 《中老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11月14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644/1207_676656/t1510505.shtml。
- [29] 《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新华网,2019年5月1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5/01/c_1124440753.htm。
- [30] 《习近平同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4月30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644/xgxw_676650/t1660014.shtml。
- [31] 《李克强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4月28日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72/xgxw_676578/t1659105.shtml。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共和国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0年1月18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88/1207_676800/t1733683.shtml。
- [33]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新华网,2018年11月15日 http://www.xinhuanet.com/ttgg/2018-11/15/c_1123718487.htm。
- [34] 《新闻背景“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谈判过程》,环球网,2017年8月7日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4xkR>。
- [35] 《李克强在第十九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阐述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9月8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xgxw_682524/t1395683.shtml。
- [36] 《中国-东盟智慧城市合作倡议领导人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11月4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xgxw_682524/t1395683.shtml。

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zywj_682530/t1712943.shtml。

[37]《李克强在第 21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2018 年 11 月 15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zywj_682530/t1613230.shtml。

[38]《深化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2019 年 11 月 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zywj_682530/t1712938.shtml。

[39]《李克强在第 22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2019 年 11 月 4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2518/zywj_682528/t1712917.shtml。

[40]Rortha Chum,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ASEAN's Perspective as a Tug of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European Academic Research*, Vol. VI, Issue 10 (January 2019), p. 5870.

[责任编辑:包广将]

Seven Decade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Experiences, Reflections and Prospects

ZHOU Shi-xin

(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200233)

Abstract: China and Vietnam established official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on January 28, 1950, marking the real beginning of diplomatic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not only experienced hostility and setbacks, indifference and vigilance, but have also shown mitigation and improvement,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ship, and the two sides are now entering a new era of close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Historically,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accumulated rich diplomatic strategic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They want to stick to their own development path, but not blindly follow or imitate models of other countries. They do not interfere in domestic affairs of other countries, or permit other countries to interfere in their own internal affairs. They seek to promote regional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process of enhanc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void unnecessary interference from extraterritorial factors, and resolve issues mutually through consensus.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sides also learned from some setbacks and lessons that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For example, they must recognize the limits of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abilities, and try to avoid harms to each other. They shouldn't expect too much from other countries, make unaffordable commitments, or consider regional hotspots in a realist way, let alone fall into security dilemmas and cannot extricate themselves, instead, they must find constructive solutions on the basis of common interests in order to promote sustainable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by cooperative measure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must stand high and forge a common sense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n the long run, both sides should consolidate and enhance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y can keep the mind to hold stable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Lastly, both must be practical and push new achievements of joint projects to be bonds that can boost a mutual identity, so that all countries and peoples in the region can experience the sense of gains derived from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of equality,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Key words: ASEAN, neighbourhood diplomacy,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strategic partnership, new era